



第七卷

社会体制改革： 理论与实践

SOCIAL SYSTEM REFORM
Theory and Practice

主编/李培林
副主编/高文璐 黄丽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七卷

社会体制改革： 理论与实践

SOCIAL SYSTEM REFORM

Theory and Practice

主编/李培林

副主编/高文珺 黄丽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李培林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

ISBN 978 - 7 - 5097 - 4789 - 6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体制改革 - 中国 - 文集
IV. ①D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327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 社会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主 编 / 李培林

副 主 编 / 高文珺 黄丽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刘 荣
史雪莲 胡 亮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岳爱华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 27.5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485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789 - 6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编委会

主任：李培林

副主任：陈光金 张翼

委员：景天魁 李春玲 罗红光 王春光

王晓毅 王颖 吴小英 夏传玲

杨宜音 赵克斌

秘书：黄丽娜

总 序

我国博士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设立的。1984年5月21日，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成。1985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施博士后制度。

我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就是1988年在北京大学设立的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则成立于1999年。1999年至2013年，14年过去了，至今已经招收了近百名博士后，他们多数都已经出站，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实践证明，中国博士后制度对于选拔、培养优秀人才，促进人才流动，创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此后，举办这个论坛成为一项制度，坚持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先后在北京、武汉、厦门、沈阳、重庆等地成功举办了七届，今年将在贵阳举办“第八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与我国其他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论坛相比，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有这样几个特色。

第一，参加人员的广泛性。参加论坛的，既不限于在站的博士后，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参加论坛的热情也很高；也不限于本站的博士后，其他高校的社会学博士后也有不少人参加；还不限于社会学的博士后，其他学科的博士后往往也来参加；而且不限于博士后，博士后的合作导师也满怀兴趣地参加。这样就使这个论坛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二，论坛会上会下交流方式多样。这个论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为依托，联谊会还设立了地区分会，他们积极参与论坛的组织工作，除了邀请著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组织专题分论坛，还组织会下的讨

论会和会后的社会调查。很多博士后反映，通过这个论坛活动，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够不站站内站外，不分学科专业背景，充分深入地交流，并能发现很多平时自己本学科容易忽略的问题，扩大了自己的学科知识面，同一个社会问题可以得到不同学科视角的诠释和理解。

第三，学术成果丰硕。论坛参加者以文入选，要提交合乎学术规范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而且论文的题目要贴近论坛的主题。而论坛的主题，往往是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样，每年论坛之后，都有一批高质量的涉及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博士后学术论文，我们选择其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就形成现在这个社会学博士后论文集的系列。我们希望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个论文集系列，能够记载我国的巨大社会变迁，也记载社会学博士后的学术足迹。

改革开放 35 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新的核心议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探索中，社会学承担着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和研究重任。但愿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的这个论文集系列，也能为担当这一学术使命贡献一份力量。

是为序。



2013 年 6 月 25 日

目 录

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

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公共政策的视角

..... 崔志坤 经庭如 / 3

矿区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研究 韩全芳 葛绍林 / 16

基本规范的中国实践

——论我国社会主义宪法法律体系的历史性和连续性 贺海仁 / 28

“抽象成为统治”：资本逻辑生成的内在机理

及其社会效应 荣 鑫 / 52

关于我国事业单位推行职业年金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游 春 / 62

关于开展大规模人事考试与人才选拔机制研究的思考 张志英 / 72

从“等级式权力”到“能动式权力”

——兼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郑少东 / 80

芬兰与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比较研究 朱海龙 熊 刚 / 91

社会管理与社会制度

城乡一体化与城乡生态资源配置 李全喜 / 103

中国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体系结构	马晓燕 / 120
新时期应急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基于建立应急管理“大区制”的构想	梅哲毛梅 / 128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对策研究	莫凡 / 147
“造真型”食品安全风险及其应对	田永胜 / 158
垄断国企改革路在何方?	王继翔 / 168
杭州湖滨街道与北京德外街道社会管理创新之比较	
——谈北京市社会心态信息收集	张胸宽 / 179

社会文化与消费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专业心理求助	高文珺 / 195
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纪江明 / 221
消费公民权：消费维权运动中的市场、国家与消费者组织	
——以“丰田召回事件”为例	林晓珊 / 240
宗教统战与公益引导	明世法 / 260
宗教信仰与团体秩序建构	石丽 / 273
“80后”青年的住房拥有状况研究	
——以“985”高校毕业生为例	朱迪 / 289

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

环保回馈：“邻避行动”化解之道	樊良树 / 305
嵌入视角下草根NGO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关系	李莉 / 312
我国农村基本药物可及性的制度构建	张奎力 / 326

家庭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服务管理制度探析

——以广东省东莞市 H 镇流动人口子女义务

教育情况为例 张文博 / 33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与实践 赵 茜 / 362

| 社会媒体与社会教育 |

新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应对

——以乌坎事件为例 张春贵 / 375

都市报关于农民工报道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以《扬子晚报》为例 朱 丹 / 387

主流文化视角下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实证分析

——以《人民日报》为例 朱 丹 / 399

返乡农民工子女学业适应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蒋国河 / 411

英文目录和摘要 / 419

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

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 公共政策的视角

崔志坤 经庭如

摘要：市场承认个人禀赋及个人拥有生产要素的差别，经过市场的初次分配后必然形成收入差距。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个人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构成了不稳定因素，不断挑战个人的心理底线。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必然因素，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同时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如个人禀赋、个人选择、机遇与运气及努力程度的差异。当前明确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目的是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因此可以考虑从公共政策的整体方面做出全局性制度创新，在使不同个人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通过公共支出政策改善起点公平，通过公共管理政策加强过程公平，通过公共收入政策形成结果公平。

关键词：收入差距 公平 公共政策

随着市场化的改革，个人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
主要桎梏之一。当然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个人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一方面有合
理的因素，另一方面存在着相关制度瓶颈的制约。公共政策是政府能够运
用的重要调控工具之一，当前单纯地从某一方面出台政策已经不能完全解决
个人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需要从公共政策的整体方面做出全局性制度创新，
这是中国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本文试从这一角度进
行分析。

一 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不断挑战个人的心理底线

衡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重要的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它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通常用字母G表示，其值在0和1之间。G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一般认为，0.4以上的G值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G值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中国经济社会二元特征明显，计算基尼系数的背景明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不透明性，也使基尼系数的计算失真。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发布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但从未给出城镇居民基尼数值的大小^①。2011年12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中提到，2010年的基尼系数比2000年略高。而更多的是学者从研究的角度按照各自的方法给出了估算的基尼系数。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共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系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而2010年，基尼系数估计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考虑到大量未被统计的隐性收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要高于这个数据。

由于没有官方权威的基尼系数统计，各方对于基尼系数的猜测高低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丘林，2012）。从财富集中的角度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分化的势头并没有停止的迹象。目前，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和利益分配矛盾，已令中低收入群体普遍感到不满，不断地挑战着个人的心理底线，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加大相关公共支出，造成了资源浪费。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个人收入差距，是中国近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①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目前不公布城镇基尼系数因难获取富人真实收入。不过，马建堂给出了基尼系数发布时间表。参见《中国基尼系数官方数据有望于2013年发布》，2012，<http://cnews.cnyes.com/Content/20120118/KFHZKXTYXBD9Y.shtml>。

二 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个人收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个人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愈发严重。当然，市场化改革以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前个人收入分配的格局。欲改善个人的收入分配现状，需要对其中的原因加以必要的分析，才能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进行相关的制度创新提供充分的依据。本文将这些因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必然因素，一类是偶然因素；必然因素表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因此要坦然面对，偶然因素说明个人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政府实施的公共政策就是减少或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当然这里区分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不是一定要把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原因截然分开，必然性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所决定，而偶然性则表明现象发生的不确定性，必然因素对事物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转化。

（一）必然因素

1.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平均主义”政策导向的存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均衡，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很小，收入分配问题并未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之后，调动地区和个人积极性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改革逐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个人收入差距在逐渐加大。其缘由有以下几点。第一，各地区的禀赋不同。自然条件优良、矿藏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个人收入增加较快；而自然条件恶劣、矿藏资源匮乏的地区在改革过程中明显具有劣势，个人收入增长缓慢，由此导致个人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第二，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在历史上，江南地区是富庶之地，徽商的兴起也给当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居民“经济”意识较强，而中原及边远的其他地区，主要依靠农业等取得收入。这种传统在改革开放之后同样遗留下来，具有较强经济意识的个人率先进入高收入者行列，如江浙地区的私营企业主等，而其他地区的个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加入“打工者”的行列，收入差距必然进一步扩大。第三，政府的政策倾斜。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的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

极性，但率先富裕起来的并不是农村居民，而是得到政策倾斜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得到资源倾斜的城镇地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向东部倾斜，无疑使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普遍提高，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第四，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政府虽然曾推出多项规划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比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但并未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政策递减效应明显。上述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进一步扩大。

2. 市场化过程中的改革不完善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在渐进中寻求突破，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却未如人意，某些政策甚至拉大了个人的收入差距。第一，户籍政策。户籍政策将中国居民的社会福利等与之出生的户籍挂钩，人为限制人口的合理流动，剥夺了农村居民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第二，收入分配政策。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重初次分配，而忽视再分配。市场经济承认人们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差别，经过初次分配后个人收入必然呈现不平等态势，这就需要政府用再分配的手段来调节初次分配的结果。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不透明又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同时中国的税收体系又以间接税为主体，这些因素导致运用税收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效果甚微。第三，国有企业的红利政策^①。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缴纳完相关税费后取得的利润理应归全民所有，而目前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更有不少垄断性国有企业将其作为工资、福利在企业内部消化，进一步拉大了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如果把国有企业利润视为全民收入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财政收入，就要纳入财政预算体系。第四，房价的快速上涨。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商品房价格呈现快速上涨之势，抑制房价的上涨目前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里我们先不考虑房价是否合理的问题，来考察一下高房价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房价的快速上涨无疑使首先拥有一套或多套住房的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获利，同时使后来买房者背负沉重的负担，从而使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在没有有效的对资本利得征税的条件下，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住房的商品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个人之间的

^①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具体收取比例分四类执行，分别为 15%、10%、5% 和免交国有资本收益。

收入差距。第五，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加大。由于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个人所承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预期支出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差，容易出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往往能够改变低收入群体的未来收入，但目前教育资源即使在同一地区分布都极不均衡，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群体比重偏低，以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收入差距在代与代之间转移。第六，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目前腐败问题表现为拥有特权的一部分群体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权力进行寻租，获得灰色收入甚至是不合法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已经在代与代之间进行转移，形成“官二代、富二代”。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在同代人之间愈演愈烈，而且在代与代之间进行转移。

上述谈到的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个人收入的差距，而这些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某些制度、政策不完善造成的，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完善相关的制度，才能缓解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二）偶然因素

1. 个人的禀赋不同

个体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善个人的某些禀赋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的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收入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考察一下高收入群体，很多都是有良好的禀赋的，如智力较高者、高水平运动员、演员等。市场化改革以来，这些优良的禀赋得到了市场的承认，并转化为个人的收入。目前，足球俱乐部人员、从事高新技术产业者、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私营企业主、建筑工程承包人、演艺界人士、高水平运动员、会计师、律师、税务师、审计师、评估师、高校教师等被认为能够取得较高收入，而这些人员往往具有较好的禀赋，这也就决定了个人收入的差距会逐步拉大，这是必然的趋势。个人禀赋是天生的，市场承认个人禀赋的不同，就像企业拥有的生产要素一样，决定了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的不均衡，因此需要政府出台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来缩小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2. 个人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赋予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普遍提高。同时，个人的选择基本上决定了以后的收入水平。目前中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工资薪金

所得，因此，职业的选择决定了个人的收入水平。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职相对来说稳定，能够取得较高的收入。但市场化改革以后，很多人纷纷选择“下海经商”，率先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取得了较高的个人收入。进入 21 世纪后，职业的选择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如银行、电信、证券、保险、石化、石油、航空、烟草、房地产、铁路、外企等单位能够取得较高的收入。而职业的选择往往是个人最重要的选择，所学专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以后从事的行业，因此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的区别。这是市场中的“信号导向”效应，而且是一种不良的信号效应，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纠正。

3. 个人的机遇与运气

中国历来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个人的机遇与运气决定了个人的收入水平。中国在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确实为个人提供了大量的机遇。一部分人抓住了这些机遇，如利用国家相关政策率先富裕起来，对于这部分高收入群体，市场是没有有效的机制调节的，需要政府进行调节。

4. 个人的努力程度

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赋予了个人较多的选择权，每个人面临的机遇与运气也不一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个人的努力程度对个人的收入同样会有重要的影响。而且个人的努力程度还可以改变个人的职业选择，改善个人面临的机遇，甚至改变个人的“运气”。但这并不表明努力一定会得到高收入，但最起码能够在一定程度改善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且，取得同样的收入，每个人付出的艰辛是不一样的，这也需要政府在宏观上通过不同的政策对不同的收入予以区别对待。如同样 10 万元的收入，有人可能是通过资本利得取得，有人可能通过劳动取得。取得同样的收入付出的努力程度不一样，每个人付出的艰辛也不一样。这就需要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在征税时采取不一样的政策予以调节。

三 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公共政策的视角

上述的分析表明个人收入差距扩大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其他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个人之间的收入也不是均等的，个人收入之间有差距是必然的，关键是政府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的实施来缩小个人收